

户籍改革的研究状况及实际进展^{*}

班茂盛¹ 祝成生²

(1.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2. 浙江省第三人民警察学校,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 引起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众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户籍管理制度产生的原因、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和户籍改革的思路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实际工作部门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修改。本文就户籍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进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关键词: 户籍制度; 改革思路; 实际进展

中图分类号: D631. 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0)01-0046-06

Status of the Studies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the Progress

BAN Mao-sheng ZHU Cheng-she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The Third Police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

Abstract Along with deepening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disadvantages of the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becomes evident, and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to by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cerned. Many studies have been made on the origi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approaches to its reform. Practical departments have made partial adjustment or improvement on the system. This article has made an over-all conclusion on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actical progress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deas of reform, progress

工业化引起城市化, 导致农村人口发生产业转移和空间转移, 这是人类社会向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迁入城市的人口

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就业困难、交通拥挤、治安恶化等, 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1], 不论是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 还是正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除朝鲜、中国等少数国家外, 都允许人口自由的迁移, 没有设置限制人口迁移的户籍壁垒, 户籍管理制度并未影响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进程, 没有干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收稿日期: 1999-10-27

作者简介: 班茂盛(1970-), 男,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法学硕士。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王嗣均教授的指导, 借此机会深表感谢!

我国情况特殊, 现行隔断城市间、城乡间人口自由迁移的户籍管理制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 成为妨碍中国社会与经济因素之一。早在 80 年代后期, 就有学者开始从事户籍改革的研究^[2], 但真正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是在 90 年代初。众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产生的原因、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户籍改革的思路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入。

一、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产生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选择了向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有学者认为^[3], 现行以限制人口自由迁移为特征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

1. 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 因此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无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产业转移, 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2. 在没有外来资本的情况下, 一个农业国建设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所需的资本只能来源于农业剩余, 当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 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获取建设重工业所需的资金^[4]。为了积累资金, 对农产品实行低价垄断收购再以低价卖给工人以降低人工成本, 同时又通过提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获取超额利润。由于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的价格扭曲, 使享受低价农产品的人口只能是少数人即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城市居民^[5]。同时, 为了维持低工资的制度, 政府又向居民提供大量的住房、医疗、粮食、教育等补贴^[6]。由于财力有限, 只能向有限的人口提供补贴。在这种情况下, 只得限制农村人口进城以控制城市人口数量, 从而减轻城市就业以及基本生活资料供应、住房、交通、公用事业等多方面的压力^[7]。

也有学者认为^[8],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演变, 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 既有经济的, 也有政治的。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计划经济的框架逐步构建完成, 迅速暴露出来一系列问题: 工业积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重工业的内部循环, 效益不佳; 第二产业难以带动第三产业和社会发展事业; 粮食与农副产品供应能力脆弱; 城市建设资金极度短缺, 基础设施生活设施欠账日增等等。这就使得

城市不仅面临就业压力, 而且生活资料的供应也是极其紧张的, 城市人口显得日益饱和。1958 年 1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 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镇。同年 9 月中共中央精减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又发出了《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明确限制小城市人口迁往大中城市。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 由于指导上的失误, 导致 1959 年到 1961 年初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同时受挫。1962 年 12 月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 再一次要求严格限制乡迁城, 并且对大城市人口增长实行特别控制。“文革”期间, 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物资短缺, 供应紧张, 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 乡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 同样是户政工作的重点。1977 年 12 月, 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确立了处理户口迁移的主要原则为: “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 下同), 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 要严格控制。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 应适当控制。”至此隔断城市间、城乡间自由迁移的户籍管理制度完全形成^[9, 10]。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大多数学者主张^[11~13], 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评价它的历史贡献, 认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曾在健全全国人口登记、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益、保持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总量、结构、布局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14]。但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毕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革, 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15~19]。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 配置的过程也就是包括资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的过程, 但是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人口的正常迁移、资本的合理流动, 使各种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最佳配置, 户籍改革势在必行。

2. 几乎所有关注户籍改革的学者都认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20~24]。长期以来, 隔断城市间、城乡间人口正常迁移的现行户籍

管理制度妨碍着人口的集聚过程,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偏低,与工业化脱节。在加速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已经形成的今天,不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就难以顺利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

3 严格限制乡迁城、农转非的人口迁移政策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转移^[29]。一些学者认为^[26~28],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剩余,尽管乡镇企业曾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乡镇企业毕竟容量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将依靠城市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已经进入城市转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事生产,但是由于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他们无法取得城市的户籍,难以在城市长期定居,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4 部分文献中提到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本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29,30],而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强化了人们的地域观念和城乡观念,造成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国家应该通过立法保证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

5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实际脱节,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在大量的自发迁移面前无能为力,以致于出现了众多的人户分离的现象^[31~33]。尽管1989年全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使用和查验制度,但身份证内容的单一以及人口信息网络的不健全,依然难以保证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

三、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一些学者认为: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改革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已经具备^[34,35]。

1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已经开始对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过程产生作用,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发育,就业信息网络的不断拓展都为人口的自由择业和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可能。

2 流动人口的增长高峰已经过去,不会出现农村人口过度流入产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是长期以来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结果。而经过几十年流动人口在规模上的积累,城市化滞后工业化所积累的“势能”已经转化为“动能”释放出来,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同时城市就业难度的增加,导致城市吸引力减小。潜在迁移人口在居住地的选择上更加理智。

3 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的增强也为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改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已经习以为常,新政策的出台不可能再引起大的社会震荡。尽管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涉及众多的社会因素,但不至于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

4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有关部门对相关政策的不断调整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居民身份证使用和查验制度的建立,户籍管理的基层网络不断健全,人口管理的手段不断提高,以及有关的政策和法规的建立与完善,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提供了可能。部分学者还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套问题作了简要阐述^[36]。

(1) 户籍改革的深入推进应当以稳定的粮食生产为前提,国家应对农业进行重点保护。应大力保护耕地,不断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建立和完善土地的二级市场,使土地生产集约化、产业化。

(2) 积极推进城市各项福利制度的改革,减少直至取消与户口相粘连的利益分配机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使企业自主用工,改革工资分配制度,使劳动者的收入显性化、货币化。

(3) 建立新的城市建设机制,改变国家单一投资的现状,通过社会多渠道筹集城市建设资金。

四、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路

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户籍改革的深入研究使户籍改革的具体思路日渐明晰^[37~43]。

1 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迁移政策的调整,即改革现行的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都主张户籍制度的改革应首先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人为界限,废止农转非的不合理政策和指标,改变迁移的准迁证制度,尊重以生活基础为依据的居住地选择,按职业划分人群,按居住地划分城乡。

2 多数学者主张建立以人为主,人户兼顾的新型户籍管理方式,户口登记与人口登记并存。在进一步完善居民身份证使用和查验制度的同时,建立公民出生证制度,并保留完整的户记录和户口簿。

3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在形成过程中,与多种本不相关的因素联接了起来,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必然要牵涉到政府系统的有关政策和社会系统的某些规范。在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时,必须做好相关的配套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4 大多数学者认为,现行户籍管理制定改革的

终极目标是建立户籍法,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形成由户籍登记、户籍迁移两项规定、户口簿、身份证、出生证三种证件和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户口形式组成的户籍管理系统。

尽管众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1)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可行性研究缺乏全面的实证分析。尽管有部分学者曾对户籍改革的可能性作过研究,但未深入进行,对潜在迁移人口的迁移意向、城市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户籍改革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改革可能引起的后果都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

(2)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关键——迁移政策的调整缺乏深入研究。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迁移政策的改革,但是约束迁移政策调整的障碍因素以及如何对迁移政策进行实质性调整等一系列问题缺乏深入研究。

(3)理论界一直没有对户籍改革的配套政策进行专门研究。要使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平稳进行,必须同时改革在长时期内形成的直接或间接阻碍人口正常迁移、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不合理配套政策(包括方针、政策、标准、管理办法等)。但是,哪些相关政策阻碍户籍制度改革?如何调整这些配套政策等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问题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

五、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际进展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推动了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从80年代起,各级政府就着手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局部的调整和修改,以适应新的形势。

1.从80年代初开始,国家开始调整“农转非”的政策。“农转非”的控制指标,由原来的不超过当地非农业人口的0.15%调整为0.2%,松动了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控制。1980年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局联合颁布了《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在规定中明确指出:凡是符合规定的专业技术干部,其配偶由农村迁往城市时,不占公安部正常审批的控制比例,“这是我国户籍管理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44]。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农转非”的对象越来越多,国家本应进一步调整“农转非”

政策,放宽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限制,但是,1989年10月,在治理整顿中,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知》,要求各地审批“农转非”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下达的“农转非”计划指标内,通知要求,即使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但没有指标的,也要暂缓办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农转非”政策的改革被迫中断。

2.8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乡迁城的问题,开始实行“自理口粮户口”制。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进一步推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逐渐显性化,同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也需要为多余的资金寻找新的投资领域,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他们迫切要求在集镇落户。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1984年10月发出了《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只要在集镇有固定的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农民及家属都可以申请在集镇落户,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但国家不向其供应商品粮,尽管“自理口粮户口”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它的实施是我国户籍政策的一项重大突破^[45]。

3.80年代我国户籍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建立了居民身份证使用和查验制度。进入8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空前增加,一户一本的《户口簿》难以保证公民进行合法的社会活动,人户分离的现象日益严重,流动人口的管理趋于失控,为此,公安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于1984年在北京首先进行了试点。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并于当月生效,1989年,公安部又制定了《临时身份证暂行规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于当年10月15日生效。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的身份证制度终于确立,使户籍管理工作开始由单独的户管理向人户结合的管理方式过渡,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80年代的十年间,尽管有关的政府部门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现行户籍制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进入90年代,职能部门对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4.为了缓解“农转非”的压力,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1992年8月公安部拟就了《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通知》,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见。同年 10 月,广东、浙江、山东、山西、河北等十多个省市先后在本地区开始试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又称为蓝印户口,其基本原则是当地有效,在当地按常住人口进行管理,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事实上只是权宜之计,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实施这一制度使买卖户口合法化,因此必须对“农转非”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5. 各地开始小城镇户籍改革的试点工作。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随后各地以公安部门为主体对小城镇户籍改革进行试点工作。在试点城镇,实行以公民住房、职业和生活来源为落户条件的迁移制度。应该说,小城镇户籍改革的试点工作是迄今为止对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所进行的最深入的改革。

6. 解决户口管理中的突出问题。1998 年 7 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户口迁移政策问题:即: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解决老年人投靠和归属的政策;解决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在城市落户的政策。对于这次政策调整,有学者认为仅仅是户籍改革的“起步阶段”,“不是解决户籍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含有应急的意味^[46]。”

7. 特殊人群的迁移问题有重大突破。1999 年 9 月 9 日国家人事部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从发文日开始,有突出贡献者和业务骨干的配偶的户口迁移,将不受年龄、分居时间、指标等各方面的限制。尽管这次的户口迁移政策调整仅仅涉及极少数的特殊人群^[47],但是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这个文件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人群可以迁往任何一级城市,应该说这是认识上的一次突破。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户籍改革的实际工作进行了将近 20 年,但仍限于政策的局部调整与修改,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 户籍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彻底性。在户籍改革 20 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受整个改革进程的影响以及观念的束缚,政府一直难以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改革,各项改革措施多为户籍管理制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出台的,有很强的应急性。政府有关部门应以实现迁移自由

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尽快出台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方案,以指导实践。

2 小城镇户籍改革无法解决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尽管有学者认为小城镇户籍改革是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48],但笔者认为:小城镇户籍改革是在现行的城市发展政策的约束下进行的,它本身只是户籍改革过程中解决控制城镇人口和城市规模政策与大量的人口迁移要求之间矛盾的权宜措施,希望通过小城镇来完成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是难以奏效的。现实的情况也证明:许多农民不愿意落户小城镇,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户籍改革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小城镇,必须扩大到各级城市。

尽管户籍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进展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有一点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已经取得共识,即户籍改革势在必行。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入,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必将全面铺开。

参考文献:

- [1]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2] 户籍研究课题组.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3).
- [3] 蔡 璠.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
- [4] 王嗣均. 论中国现阶段大城市的增长.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
- [5] 蔡 璠.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
- [6] 刘宗昌, 刘显章. 中国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城市化. 人文杂志, 1992(3).
- [7] 王嗣均. 论中国现阶段大城市的增长.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
- [8] 王嗣均. 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研究报告). 1999(7).
- [9]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10] 户籍研究课题组.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3).
- [11] 李玉峰.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城市, 1995(4).
- [12] 户籍研究课题组.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3).
- [13] 李竞能.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看法. 人口研究, 1997(3).
- [14]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1996.

- [15] 户籍研究课题组.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3).
- [16] 王嗣均. 论中国现阶段大城市的生长.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
- [17] 乔晓春.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研究, 1997(3).
- [18] 杨彦彦. 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4. 350, 351.
- [19] 李玉峰.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 城市, 1995(4).
- [20] 杨彦彦. 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4. 350, 351.
- [21] 李玉峰.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 城市, 1995(4).
- [22] 刘宗昌, 刘显章. 中国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城市化. 人文杂志, 1992(3).
- [23] 丁军. 沿海地区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屏障分析. 城市问题, 1993(2).
- [24] 俞德鹏. 户籍制度与城市化. 城市问题, 1994(1).
- [25]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26] 户籍研究课题组.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3).
- [27] 蔡 翥.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
- [28] 杨初.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城市问题, 1996(1).
- [29] 王嗣均.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重点处理好三个问题. 人口研究, 1997(3).
- [30] 李玉峰.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 城市, 1995(4).
- [31]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32] 户籍研究课题组. 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9(3).
- [33] 李竞能.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看法. 人口研究, 1997(3).
- [34] 乔晓春.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研究, 1997(3).
- [35] 李竞能.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看法. 人口研究, 1997(3).
- [36] 李玉峰.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思考. 城市, 1995(4).
- [37] 张纯元. 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给户籍改革指明了方向. 人口研究, 1997(3).
- [38] 乔晓春. 关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研究, 1997(3).
- [39] 王嗣均.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重点处理好三个问题. 人口研究, 1997(30).
- [40] 商俊峰.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管理问题与对策. 城市问题, 1996(3).
- [41] 顾朝林. 论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研究方向. 城市问题, 1994(6).
- [42]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43] 怀古.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种种.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哲社版), 1995(4).
- [44]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45] 殷志静, 郁奇虹.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 [46] 邓梅芳. 户籍改革能否一步到位? 新周刊, 1998(20).
- [47] 陈鹏. 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重大突破. 人民日报, 1999. 9. 10(3).
- [48] 刘纯彬. 小城镇—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切入点. 社会(沪), 1997(1).

(上接第 40 页)

- [3] 王跃生. 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41.
- [4] 迫田章子(日). 中国户籍与日本户籍的比较. 国外社会学, 1996(3).
- [5] 田方, 陈一筠. 国外人口迁移.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6. 26—30.
- [6] 田方, 陈一筠. 国外人口迁移.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6. 26—30.
- [7] CASSHN, R. H. India: 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8. 119—127.